

中共宣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著

# 渡江战役

# 史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中共宣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著

# 渡江战役史

主 编 蔡长雁 施昌旺  
副主编 张奇才 郭照东



安徽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渡江战役史/中共宣城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81110-735-7

I. 渡… II. 中… III. 渡江战役 (1949) —史料 IV.  
E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29399号

---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印 刷: 安徽省地质印刷厂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230039)	开 本: 710×1000 1/16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8846	印 张: 19
发行部 0551-5108743	字 数: 310千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责任编辑: 姜 萍	印 次: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封面设计: 孟献辉	

---

ISBN 978-7-81110-735-7

定 价: 40.00元

---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目 录

第一章	渡江战役前的形势 .....	(001)
第一节	渡江战役发起前的政治形势 .....	(001)
第二节	渡江战役发起前的军事形势 .....	(016)
第三节	渡江战役发起前的经济形势 .....	(022)
第二章	国共双方在“和谈”中的斗争 .....	(031)
第一节	“和谈”的背景 .....	(031)
第二节	北平和谈的举行 .....	(038)
第三节	《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主要内容 .....	(046)
第三章	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前的准备 .....	(060)
第一节	战略决策 .....	(060)
第二节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拟定 .....	(067)
第三节	渡江战役发起前的中共中央华东局 .....	(085)
第四节	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部署 .....	(093)
第五节	渡江时机的抉择 .....	(108)
第六节	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和政策纪律教育 .....	(112)
第七节	人民解放军的渡江侦察与水上练兵 .....	(114)
第四章	人民支前与后勤保障 .....	(120)
第一节	渡江战役支前后勤工作的谋划 .....	(120)
第二节	华东支前司令部的统筹指挥 .....	(123)
第三节	渡江战役支前工作的实施 .....	(128)
第四节	渡江战役后勤工作的实施 .....	(136)
第五章	百万雄师过大江 .....	(143)
第一节	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	(143)
第二节	中集团中线率先突破 .....	(151)

第三节	东、西两大突击集团全面渡江·····	(161)
第四节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168)
第五节	“紫石英”号事件·····	(184)
第六章	追歼逃敌 截断浙赣线·····	(189)
第一节	调整作战部署·····	(189)
第二节	围歼宁、镇、芜逃敌·····	(191)
第三节	第7兵团攻占杭州·····	(198)
第四节	第3、5、4兵团逼近浙赣线·····	(205)
第五节	第7兵团攻取整个浙江·····	(210)
第六节	第3、5、4兵团截断浙赣线·····	(219)
第七节	二野第3、5、4兵团继续追歼逃敌·····	(224)
第八节	江南策应与瓦解策反·····	(226)
第七章	解放武汉、南昌·····	(236)
第一节	解放武汉·····	(236)
第二节	解放南昌·····	(246)
第八章	上海战役和上海解放·····	(252)
第一节	上海战役前的形势·····	(252)
第二节	上海之战的准备工作·····	(264)
第三节	上海战役的经过·····	(276)
参考文献	·····	(296)
后记	·····	(301)

# 第一章 渡江战役前的形势

## 第一节 渡江战役发起前的政治形势

### 一、国际形势

#### (一)美国在华扶植新的代理人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蒋介石反动统治行将崩溃,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美国为了延长它在中国的统治,开始考虑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取代蒋介石。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采取了以下行动:

首先,扶植新的代理人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取代蒋介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划下,国民党召开了“行宪国大”,蒋介石由国民政府主席变成总统,同时美国暗中积极地选中当时在南方保存较多实力、并为它所宠爱的李宗仁做副总统,以便必要时取代蒋介石。

1948年4月4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全会议程是专门讨论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问题。蒋介石主持会议,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政治腐败、军事失败、经济破产而遭受美国的责难,特别是由于总统的权力不够大,蒋介石故意在会上表示不参加总统的竞选,宁愿做有实权的行政院长,而首届总统应该由学术上有成就、国际上有威望和曾经对国家有贡献的党外人士担任。经过全会和中常会的多次讨论,最后决定蒋介石做总统候选人,并对蒋进行劝进,为了扩大总统的权限,又在宪法外另立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权。于是4月18日,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就表明宪法在未实行以前,已经遭到蒋介石的破坏。19日蒋介石以2430票当选总统,陪选人居正只得269票,废票35张,这35张废票中,有的在蒋介石后面打叉的,甚至有写孙中山的。

原来蒋介石提出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并内定孙科为副总统候选人,以顾全大局为名,迫使李宗仁退出竞选,但是由于

李的极力反对,被迫取消。这反映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4月23日国大开始选举副总统。候选人有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6人。副总统的选举,依据选举法的规定,由于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因而连续举行了四次。整个选举过程充满着激烈的斗争。蒋介石和CC系为了支持孙科当选,不惜用重金和各种手段大拉选票,并造谣中伤,动员党部、同学会、政府机关、宪兵、警察等一起出动,威胁、利诱或大打出手,甚至派薛岳、张发奎和余汉谋等几个上将率领广东代表,捣毁了刊载孙科及其姘妇兰妮丑闻的《救国日报》报馆,并与支持李宗仁竞选的该报社社长兼主笔龚得柏隔楼梯对骂。李宗仁也不示弱,组织力量反击。并以以退为进的策略,联合程潜,并声称这次“国大”存在某种压力,使其代表不能“自由”投票,选举实难有“民主”结果,表示放弃竞选,以此对蒋介石进行要挟,使孙科处于尴尬境地,也不得不放弃竞选。在这种情况下国大被迫停止开会。蒋介石多方疏通,派人请各候选人放弃竞选,直至4月28日国大又重新开会。经过短兵相接,激烈地争夺,29日的第四次选举,李宗仁以1438票的微弱多数战胜了得票1295的孙科,当选副总统。

其次,组织国民党残余力量及所谓的地方势力,在华南和其他边境建立反革命据点,做最后的顽抗。1949年2月5日,孙科迁国民政府于广州后,在美帝国主义积极支持下拉拢国民党残余分子与地方实力派的活动也正在加紧进行,他们联络政学系分子与CC系对抗,并唆使刘湘旧部刘航琛等组织所谓的“和平统一大同盟”,从事假和平的阴谋活动。美国还栽培台湾的孙立夫,支持宋子文到香港拉拢国民党的旧军官,拉拢华北的傅作义、阎锡山(1949年5月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西北的马鸿逵、马步方以及滇、川、康、黔地方实力派,企图组织西北区、南方或西南区的反共大联合。

再次,美国扶植中国“第三种政治势力”,以各种伪装和办法,阻止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美国扶植中国“第三种政治势力”的阴谋,则在抗战胜利后就已着手进行。1946年“双十节”,司徒雷登发表一篇讲演,号召自由主义者起来在“蒋主席领导下”进行一场“革命”。这时在中国就有一群文人发表什么“十人书”来响应,政学系的《大公报》副刊《时代青年》也对此展开了讨论。在马歇尔来华“调处”期间,美国就加紧了支持中国“第三种政治势力”的行动。马歇尔利用每个机会拉拢对美蒋抱有幻想的中间党派和知识分子,要他们组织一个“有力量的自由主义集团”,使他们在“政治的局势里发生影响”。他在离华声明中,特别强调:自由主

义者起来在“蒋主席领导下”进行一场革命。艾奇逊编纂的《白皮书致杜鲁门的信》中,也供认马歇尔宣布调停失败后,仍停留在中国的原因之一,就是“将鼓励中国非共产区域的自由分子,较过去更有力地发扬他们的力量”,“呼吁朝野的自由主义分子出面领导”,“走向和平与团结之路”。魏德迈来华后,美国放宽了对“自由主义”分子选择的尺度,由过去一些对美蒋抱有幻想的中间党派及成员,扩充为一切所谓爱国的知识分子,并以“知识分子”大团结,推动“新的革命运动”等口号,欺骗民众。魏德迈还特地到北平去寻找一些“自由主义”的教授名流谈话。这时,《观察》杂志上大谈“自由主义分子结合运动”,有人提出“民主国际”的计划。胡适、张伯苓等在1947年春,组织所谓的“华美协进会”;同年秋,又分别在北平、天津组织所谓的“民治促进会”,企图借此勾结一批教授、文人、名流士绅,供美帝国主义驱使,和革命力量相对抗。到1948年初,蒋介石政权的危机更深了,美国也愈益加紧导演自由主义运动的丑剧。1月间,《大公报》连续发表了《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等社论,宣传什么“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同期,和国民党CC系有密切联系的民社党革新派发表言论,称和各党派联络,打算成立“新的中间派”,作停止内战的呼吁。2月间,司徒雷登出面接连发表所谓《告中国人民书》和对记者谈话,公开要求他心目中所谓的“曾受教育的爱国人士”组成一新党,“支持政府,谋致中国和平之努力”,以便使帝国主义的援助“得到最大效果”。在美帝国主义的鼓动下,3月1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北平应运而生。此外,由钱昌照出钱、萧乾主编的《新路周刊》等鼓吹“自由主义”的刊物也接踵而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发起人钱昌照、孙越琦、吴景超等,都是和宋子文、张群等关系密切的人,而宋张当时又是被美帝国主义选中可以继续保存的反动首领。根据当时各方面揭露,“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经费,是由美国洛克菲勒给予的津贴,宋子文也拿出了一笔经费。该会的首脑分子,一开始就接受司徒雷登的指示。因此它在成立之初所发表的32条主张,以及《新路》杂志,表面伪装成一副超然的面孔,宣传只对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实际上是为中美反动派涂脂抹粉,出谋献策。他们在美蒋反动派发动大规模内战,屠杀中国人民时,默不作声,而当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蒋家王朝行将崩溃的关头,却装出一副公允的面孔说话。说什么“不诉诸武力的革命也照样能实现社会主义”,因为武力包含“屠杀”、“恐怖”、“强制”,是反理性的,主张“采取和平方法较之诉诸武力革

① 烦章:《用和平方法能实现社会主义》,《新路月刊》第1卷第6期。



命实胜一筹”。<sup>①</sup>极力吹捧美国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蒋介石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开脱罪责。说蒋介石的政绩不良,“不能也不应由政府一方面来负责”。国民党政府终于套上了英美式民主的面具,“走上行宪的大路”,“已不是一个独裁的政权”,“再改一个政权上来,我们有什么把握使他们不被名利所趋而再胡搞20年?”<sup>②</sup>这些由美帝国主义扶植的“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分子,在1948年5月以前,基本都不敢对蒋介石的权力触动一下,但到5月份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他们就顺着美帝国主义的意思,逐渐吞吞吐吐地唱出“反蒋拥李”的调子。这些“中间路线”的“自由主义者”,刚一出现就遭到中国共产党和进步文化人士的揭露和驳斥。当时革命舆论界指出,曾在抗战末期和抗战胜利后作为政治主张出现的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到1947年已完全分化,而作为社会分野的中间势力,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下,已经唾弃了本来行不通的第三条路线,转向革命方面。到1948年出现这些扛着“中间路线”旗帜的团体,其主体完全是反动分子,它们已不同于前一时期代表中间势力的民主党派。这些团体活动的目的,只是对已占有优势的革命力量进行破坏,给日暮途穷的反革命力量以幻想,帮助反动统治延长寿命。当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指出,这种“自由主义运动”,不是“一种思想运动,它的实质只是一种‘政治阴谋’,今天‘和谈阴谋’中的一部分”,是“向民主阵营”的“可怜的攻势”,必须予以“揭露”。<sup>③</sup>新华社社论《旧中国在灭亡,新中国在前进》中指出:“我们今天就该预先告诉人民,就应该揭露反动派的各种阴谋,以便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策划新的和谈阴谋,以延缓国民党政府的垮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长江以北已经全线溃退,长江以南已不可能组织系统的防御力量。在这种形势下,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看到用单纯军事斗争的方法,已不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因此,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用政治斗争的方法来阻止中国革命的前进。这时,美帝国主义已经由单纯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非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同时,为了

① 蒙毅:《现政府有改善的希望》,《新路周刊》第1卷第9期。

② 胡光:《自由主义运动的批判在香港》,《香港通讯》1948年4月2日。

欺骗人民,取得喘息时间,然后重整旗鼓,进行顽抗,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指使下,玩弄起新的“和平”阴谋。

## (二) 苏联对华政策由“中立”倾向支持中国共产党

内战初期,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已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并保持着外交关系,如果苏联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肯定有损苏联的国际信誉。这对西方宣传来说犹如火上浇油,将促使他们展开宣传运动,说莫斯科在指挥一场共产主义的世界阴谋活动。这样一来,莫斯科将承担风险,美国和英国方面将认为他们可以不再受《雅尔塔协定》的约束,进而收回同意对苏联兼并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承诺,以及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属于苏联利益范围的承诺。斯大林力图避免在世界舆论面前承担说谎的恶名,因此苏联正式宣称,它在中国内战问题上持中立的立场。

1947年夏,中国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接连取得重大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并取得辉煌成绩的事实,使得苏联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从1947年12月起,苏联的报刊与广播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和评论逐渐增多,并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给予了积极的声援。12月1日,莫斯科电台发表评论指出:“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得到了成千上万人民的拥护。他们为着保卫民族尊严和荣誉,进行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计划的斗争,并且加强了在这个斗争力量中的领导威信。一切真正的爱国分子都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团结起来了。”<sup>①</sup>

与此同时,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也在改变。1948年2月,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时,斯大林说:“战后,我们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讨论中国的局势。我们直率地对他们讲,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前景,中国同志应当寻求同蒋介石暂时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中国同志在莫斯科这里同意这种看法,但回到中国以后行动又是一样。他们控制并组织自己的军队,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在打蒋介石的军队。根据中国现在的情况,我们承认是我们错了。”<sup>②</sup>

受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明显转变的影响,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对中国的革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声援。由原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改名的《世界新闻与观察》,不断报道中国革命的

① 向青等:《苏联与中国革命》,第5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② 转引自弗拉基米尔·吉杰耶尔《铁托传》,伦敦,第331页,1954。

消息。1948年8月21日,该刊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题,摘要刊登了毛泽东1948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9月13日,该刊报道了8月1日至22日在哈尔滨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盛况。

中国解放战争捷报频传的事实,使苏联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是大势所趋。为了使由中共掌权的中国成为以苏联为首的反帝阵营的可靠成员,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态度由回避转为关注和赞扬,并逐渐加强了与中共的联系。由于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已提上日程,新中国有很多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的问题需要向苏联请教,中国共产党也迫切需要加强与苏联的来往。因此,在革命胜利前夕,苏联与中共高层领导人进行了秘密互访,苏联在关于中国的重大问题上,或是注意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或是积极主动地提出各种建设性意见和建议。由于苏联与中共联系日益密切,毛泽东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正式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

1948年4月,解放军收复延安后,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与在那里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1948年5月,在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后,毛泽东产生了即时访问苏联的想法,准备由六七人组成一个精干的代表团,乘吉普车从这里出发,经内蒙到达外蒙,再由苏联派飞机来接,并向苏联提出了这一方案。斯大林很快复电说:我们欢迎你来访。但中国解放战争正处在紧要关头,战斗还很激烈。在这个时候,统帅不应离开自己的岗位。如果你有重大问题要同我们商量,我们可以派一位负责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听取你的意见,然后进行协商,你以为如何?<sup>①</sup>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于5月27日前往西柏坡。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反动统治摇摇欲坠。为了赢得喘息的时机,国民党政府又玩弄起“和谈”的阴谋。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出了求和声明。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国民党企图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因此没有接受蒋介石的要求。1949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分别向苏美英法四国发出备忘录,希望通过他们的调停与中共进行谈判。

在收到国民党政府备忘录的第二天,斯大林将此件的内容转告了中共中央,同时附上了苏联草拟的复文以征求中共的意见。复文内容是,苏联政府向来主张中国国内停战,并且建立和平。但是,在未表明是否同意调解之前,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对方,即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苏联承

<sup>①</sup> 向青等《苏联与中国革命》,第5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担调停。斯大林的电报还进一步建议中共中央,怎样对待国民党政府请求外国帮助调解内战的提议。电报说,如果征询你们的意见,大致可以如此答复:中国共产党向来赞成中国国内和平,但中国的内战不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的,而是南京政府开始的。它应当对战争的后果负责。中国共产党人赞成与国民党谈判,但是不要那些掀起中国内战的战犯们参加。中国共产党主张直接与国民党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调解,中国共产党特别认为这样的外国调解是不可能的,即它们自己以其武装力量与海军参加中国内战而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这样的国家对于清除中国战争的态度不可能是中立的和客观的。斯大林的电报还表示,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同意他们的答复,就请中共代他们拟定一个更妥善的复文。

斯大林的电报表明苏联一是赞成国共停止内战进行和谈,二是反对美国担任调停角色,而想由苏联出面。但由于不知中共赞成与否,且又不能无视中共的意见贸然应允,因此先来探询一下中共的态度。

在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情况下,苏联的这种打算实际是对中国革命的阻挠。因此,毛泽东在1月11日回电中表明了中共拒绝任何国际调停和不准备谈判的立场。回电表示,“我们认为,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要求苏联调停中国内战的照会,应作如下的答复:苏联政府向来是、现在仍然是愿意看见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统一的中国。但是用何种方法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未便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和的工作”。毛泽东还告诉斯大林,中共倾向于要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并充分揭露敌人的阴谋;阐明中国革命已胜券在握,不再用迂回战术,推迟取胜时间。当天,斯大林即来电向毛泽东作解释说,他们关于要中共同意进行谈判的建设的用意是“破坏和谈”,因为在没有外国调解,特别是没有美国调解以及中共提出的不要蒋介石等战犯参加的条件下,国民党是不会同意进行会谈的。斯大林表示同意按中共草拟的内容答复南京政府。

经过一番斟酌,中共决定部分采纳苏联的建议,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但是坚决反对蒋介石提出的谈判条件。1月14日,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毛泽东提出,蒋介石于今年1月1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

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1949年1月下旬,在三大战役取得胜利,长江以北已牢牢控制在中共手里的情况下,斯大林履行他几个月前作出的承诺,派人来中国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1月3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贸部长米高扬从大连苏军基地乘飞机直达石家庄,然后乘汽车来到西柏坡。随同米高扬来的有苏铁道部副部长柯瓦廖夫以及翻译和警卫人员。米高扬在西柏坡停留了一个星期。2月7日回国。

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名成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一起与米高扬进行了多次谈话。米高扬首先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问候,祝愿中共尽快取得革命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在会谈中,中共中央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向米高扬详细介绍了国内战争的形势,说明中共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条件。毛泽东说,可能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是说,比过去我们预计的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和主要市镇。在江南拿下几个重要城镇后,就不会再遇到敌人特别顽强的抵抗了。我们军队的斗志是昂扬的,士气是旺盛的。只要指挥得当,在战略、策略和战术上都不犯重大错误,我们取得完全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的口号、政策都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全国工农群众和先进知识分子阶层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这是我们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有利条件和良好机会。这个时机不能失去。“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是我们战略性的指导口号,而且将要在实际行动中逐步实现。对于担心美国干涉中国革命,毛泽东说,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会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大量供应给蒋军,其他帝国主义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直至取得胜利的条件之一。

1949年4月,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夕,斯大林给毛泽东发来长电,除对新中国建设提出一些建议外,还对渡江后的军事行动发表了看法,提醒中共注意帝国主义可能的干涉。根据斯大林的提醒,中共进一步做好了防备帝国主义可能干涉中国革命的准备,并决心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试探予以坚决回击。由于中共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和军事上的准备,美国等外国武装力量最后不得不放弃

他们的企图，灰溜溜地撤离中国内地。

## 二、国民党内部“逼蒋下野”

1948年底，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军事惨败，民怨沸腾，使国民党统治内部出现了新的危机。11月26日，翁文灏内阁因发行金圆券而崩溃倒台。蒋介石初意胡适出来组阁，胡适以缺乏政治才能和患心脏病为由拒绝出来组阁。蒋又邀请张群，亦被婉言拒绝。然后又请张治中出任行政院长，张则提出以变更“戡乱”政策为条件，蒋介石不允许。最后逼刚刚动过手术的孙科出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看到国民党分崩离析的局面而不能控制，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美国寻求帮助。11月9日蒋介石致函杜鲁门总统，要求他“迅速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并发表关于美国政策上之坚定声明”，以鼓舞军民士气，并巩固政府地位，被杜鲁门婉言拒绝。蒋介石万般无奈，又派宋美龄赴美寻求援助，28日宋美龄以私人名义走访杜鲁门、马歇尔，提出一整套要求美国援助国民党的计划：“（一）美国发表支持蒋介石政府反共目标的正式宣言；（二）派一高级军官来中国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之计划；（三）核准一个军事与经济援助蒋介石政府的三年计划，每年约需要10亿美金。”<sup>①</sup>这些要求亦遭拒绝。美国认为，中国“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外，任何数量之援助”，均于事无补。实际上，美国已经对蒋介石失去信心，正酝酿着蒋、李换马。孙科上台不久，司徒雷登的中国顾问傅泾波就告诉孙氏：“（一）美国希望蒋介石下野；（二）希望新阁主和。”<sup>②</sup>

蒋介石接连碰壁，走投无路，遂又玩起了下野的把戏。12月4日，他召见吴忠信，要吴接替吴鼎昌出任总统秘书长，任务是蒋介石下台后“拉李宗仁上轿”。12月14日，蒋介石又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带信给李宗仁，对蒋介石下台问题进行洽商。最后达成一个非正式协议：（一）蒋介石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二）李宗仁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四）和谈准备：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乙、运用外交，特别是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与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sup>③</sup>

①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② （台）秦孝仪：《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第8册），第1438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

③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2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然而，坐镇汉口的白崇禧得知消息后，表示蒋介石必须辞职，由李宗仁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12月22日，白崇禧在汉口扣留了蒋介石运送军械南下的船只，并反对从汉口地区抽调军队增援徐州。同时白还派邓汉翔赴南京，要蒋介石从速下野。蒋介石乃派张群、吴忠信赴汉口，向白崇禧提出：（一）如欲总统辞职，必先有保国安民及不受奸匪欺诈之办法；（二）继任者必须有切实准备，并正式交替；（三）对前方被围之部队，必须救援出险。对此，白崇禧置之不理，反而于24日向蒋介石发出通电，表示军心、民心均不应再战，要求：（一）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苏英出面调处而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25日，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发出通电，倡议与中共和谈，要求蒋介石下野。同日，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一批43人战犯名单，蒋介石居首，李宗仁为次，白崇禧第三，这对蒋氏和新桂系都是一大震撼。26日，李宗仁提出五项要求：（一）蒋介石下野，李宗仁继大任；（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国共两军各后退30里；（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军撤退，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中共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sup>①</sup>12月30日，白崇禧再电蒋介石，警告说“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与我，恳请趁早英断”。同日，湖北省参议会和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均致电蒋，要求他“寻求途径，恢复和谈”。这期间，司徒雷登也表示“以私人言，确实忠诚赞助和策划着摆脱困境，创造‘新机’”。所不同者是桂系乘机逼蒋下野，以图取而代之。而蒋介石是不会轻易就范的。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谈的具体方法”。但必须以保存国民党宪法、法统和军队为条件。他表示：“和平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党的公意是从。”显然，蒋介石这个虚伪的声明，是为了从桂系手中夺回“和平攻势”的主动权。1月2日，蒋介石又分别致电白崇禧和张轸，既拉拢又威胁，致白崇禧的电文说，“如何乃可化除共产党赤祸全国之野心”，“如何乃可防止共产党翻云覆雨之阴谋”，“甚冀惠示其详”，“今大计虽已昭明，而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守静；藉期齐一趋步，巩固基地；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而不为共军所算。则幸矣！”蒋介石又指责张轸等人，“中共匪分化之阴谋”，不仅会使国民党“陷

<sup>①</sup>（台）秦孝仪：《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第8册），第1439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

于各个被击破之惨局”，而今也关系到“兄等自身之安危”。他拉拢张轸说，愿意与张“共挽艰危”。1月8日，蒋介石派张群飞汉口，向白崇禧传达他的两点意见：“（一）余如果‘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二）余欲‘引退’必由自我主动。”<sup>①</sup>同时，蒋还命行政院副院长吴铁成照会苏、美、英、法四国，希望从旁协助。

但是，蒋介石这种以攻为守的伎俩未产生任何效力。桂系倒蒋决心已定，白崇禧仍上书要蒋介石用外交手段，利用第三方人士和中共和谈。一些人甚至公开表示，若蒋介石不允退让，则他们的军队退出武汉地区。白、李之间信使往返，络绎不绝，进一步谋划逼蒋对策；白崇禧还派黄绍竑赴香港，请李济深代为与中共联系，而美、英、苏、法四国则于20日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这种局面连CC派谷正纲、张道藩等人，也认为蒋介石下野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了。

正当蒋介石作困兽斗之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1949年1月14日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这对蒋介石是一个致命的打击。1月16日，蒋介石邀请民社党代表张君勱、青年党代表左舜生及张群、陈立夫等人座谈，交换对中共所提八项条件的意见，邵力子“公然主张无条件投降”。17日，国民党召开中政会，商讨中共事宜，竟有人对蒋介石大加指责。立法委员中也有50多人要求“政府速向中共求和”。1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会议决议：“愿与共方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谈判。”社会舆论更是盛传“非蒋介石下野，则美援不来”；“非蒋介石下野，则和谈不能进行”。时局至此，蒋介石深感大势所趋，无可挽回，乃决心“引退”。“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1月21日，蒋介石发表“引退”声明：“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遂乘“美龄号”专机经杭州于次日飞抵奉化溪口老家。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表明国民党营垒中分化出一个主和派。但是，下野后的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以党控政”，使“代行总统职权”的李宗仁陷入和战皆不能自由的困境。这就预示着蒋、李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会日益激化。国民党内这种不可调和的派系矛盾，必将加速国民党政治统治的灭亡。

<sup>①</sup> 陈孝威：《为什么会失去大陆》（下册），第575页，文海出版社，1964。



### 三、中共中央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

#### (一)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为了和国民党进行决战并解决战略决战上的重大决策问题,把胜利推向全国,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7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人,还有重要工作人员10人,其中有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同志。这次中央会议,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在这以前,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分散在各解放区,从事紧张的解放战争,再加上交通十分不便,不可能举行这样的会议。这时,广大的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已基本连在一起,交通阻隔状况已经改变,军事形势又发生了根本变化,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决战阶段。根据这一大好形势,党中央提出,要将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城市。这确实是振奋人心的伟大奋斗目标。就是说,我们党面临的任务,再不是夺取局部的胜利,而是把夺取全国的胜利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所以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次会议,在总结了过去两年作战成绩的基础上,规定了下一时期的工作任务,最突出之点,是明确提了解放战争第三年的作战任务。

为了实现上述这一伟大目标,党中央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下述各项任务:<sup>①</sup>

首要任务是大量歼灭敌人,将战争扩大和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去。会议详细分析和估计了敌我力量的基本情况。敌人方面,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1946年7月为430万人,两年被歼和逃亡的总人数为309万人,补充344万人,现有365万人,估计今后三年尚能补充300万人,同时三年之内被歼和逃亡可能达到450万人左右。这样,五年(从1946年7月算起)作战结果,国民党的军队,可能只剩下200万人左右了。我军的情况,现有280万人,今后三年准备收容俘虏170多万人参加我军,动员200万农民参军。除去消耗,五年作战结果,是我军人数可能达到500万人。如果五年作战出现这样的结果,就可以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从根本上被打倒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会议明确规定,今后每年必须歼灭敌人100个旅左右,即歼灭150万左右的敌人。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这个任务不能完成,我们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伟大目标,就不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实现。党中央还指出,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在长江

<sup>①</sup> 转引自冷杰甫《三年解放战争》,第300~303页,旅游教育出版社,1988。